



儒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(陈增辉)

(2005-7-15 10:20:45)

作者: 陈增辉

甲兵强锐、威震四海的隋朝由全盛而骤亡，引起了李唐君臣们的惊戒。在总结“彼之所以失”的教训时，李世民说：“往昔初平京师，宫中美女珍玩，无远不满，炀帝意犹不足，征求无已。兼东西征讨，穷兵黩武，百姓不堪，逆致亡灭。此皆朕所目见。”（《贞观政要·政体》。下引此书，只注篇名）“炀帝广造宫室，以肆行辛。自西京至东都，离宫别馆，想望道次。乃至并州、涿郡，无不悉然。驰道皆广数百步，种树以饰其傍。人力不堪，相聚为贼。逮至末年，尺土一人，非复己有。”（《行幸》）穷奢极欲、鱼肉百姓是隋由全盛而骤亡的根本原因。魏征在上奏中反复指出：“昔者有隋，统一环宇，甲兵强锐。三十余年，风行万里，威动殊俗，一旦举而弃之，尽为他人之有。……

（炀帝）恃其富强，不虑后患，……宫苑是饰，台榭是崇。徭役无时，干戈不戢，……民不堪命，率土分崩。”

（《君道》）“我之所代，实在有隋。……隋氏以富强而丧败，动之也。我以贫穷而安宁，静之也。……昔隋氏之未乱，自谓必无乱，隋氏之未亡，自谓必不亡，所以甲兵屡动，徭役不息。……鉴国之安危，必取于亡国。……臣愿当今之动静，必见隋氏以为殷鉴，则存亡治乱，可得而知。”（《刑法》）在总结隋亡的教训中，李世民和魏征悟出一个真理：“国以民为本”（《务农》）。李世民说：“君依于国，国依于民。刻民以奉君，犹割肉以充腹。腹满而身毙，君富而国亡。故人君之患，不自外来，常由身出。夫欲盛则费广，费广则赋重，赋重则民愁，民愁则国危，国危则君丧矣。朕常以此思之，故不敢纵欲也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二）又说：“天子者，有道则人推而为主，无道则人弃而不用，诚可畏也！”（《政体》）魏征奏曰：“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。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”（《君道》）

基于以上认识，他们确定了以“存百姓”为宗旨，以“简静”为特征，以“营衣食”为主题的治国方略。李世民一即位就宣布：“为国者要在安静。”（《新唐书·突厥传》）他“夙夜孜孜，惟欲清静，使天下无事。”（《政体》）魏征从隋富强因动而丧败、唐贫穷因静而安宁的现实中，悟出了“静之则安，动之则乱”的真理。针对当时“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，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”的现实，他向唐太宗疾呼：“国之衰弊，恒由此起。”认为要免蹈亡隋覆辙，必须贯彻“简静治国”方针（《君道》）。李世民清醒地看到：“人君简静乃可致耳。”（《务农》，致什么？致

“安人理国”（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）。为此，必须从解决民食问题着手。他说：“国以民为本，人以食为命，若禾黍不登，则兆庶非国家所有。既属丰稔若斯，朕为亿兆人父母。”（同上）由此出发，他非常重视农业，“唯思稼穡之艰，不以珠玑为宝。”（《旧唐书·良吏传》）隋末社会大动乱造成了“茫茫千里，人烟断绝，鸡犬不闻，道路萧条”的残局。在讨论天下怎样才能大治时，李世民等得出结论：“抚民以静”，“静者，为化之本。”（《魏郑公谏录》卷三）“静以抚之”成为根本的治国方略。李世民说：“国家未安，百姓未富，且当静以抚之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一）在唐初的治国方略中，存百姓、简静、营衣食是有机统一的，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，其具体措施是：推行均田，奖励垦荒；实行租庸调法和轻徭薄赋；劝课农桑，不夺农时；设置义仓，救灾备荒；增殖人口，发展生产；释放宫女，任从婚嫁；兴修水利，消除水害；去奢省费，选用廉吏。由于这些措施的落实，促成了“贞观之治”的到来。唐太宗说：“贞观以来，手不释卷，知风化之本，见理政之源。行之数年，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。”（《慎终》）后之史家在将“贞观之治”与“文景之治”进行比较时指出：“恭俭不若孝文，而功烈过之矣。”（《唐鉴》卷六）肯定贞观时期是比文景时期更为繁荣的太平盛世。

四

宋明时期，民本思想继续绵延。两宋时期民本思想的代表是二程和朱熹，他们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出发，一反荀子“上者下之本”的论调，提出了“下者上之本”（《周易程氏传·剥》）的命题。指出：“上，谓人君与居人上者，观剥之象而厚固其下，以安其居也。下者，上之本，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。故上之剥必自下，下剥则上危矣。为人上者，知理之如是，则安养人民，以厚其本，乃所以安其居也。”（同上）基此，他们提出了“安养人民，以厚其本”的具体措施，诸如爱民如子，以口授田，力穡厚生，薄赋宽役等。朱熹从南宋社会的现实出发，明确提出：“国以民为本，社稷亦为民而立。”（《四书集注·孟子集注》卷一四）“丘民，田野之民，至微贱也。然得其

心，则天下归之。”（同上）并得出结论：“王道以得民心为本。”（同上，卷一）由此，他主张爱民如子，取信于民，与民同乐，富民为本等。从元末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朱元璋，由自己的出身和经历而深知民之厉害，他反复指出：“为政以得民为本”（《明实录》卷一七），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”（同上，卷七六）他采取了奖励垦荒、严禁土地兼并、宽赋省役、节用民财、严惩贪暴等一系列措施，使处于消沉时期的民本思想，获得了新的起色。明末农民起义，经过十七年的苦战，终于推翻了朱明王朝。人民力量的伟大再一次得到了充分显示。实践孕育了中国民本思想的第三次高峰，其思想代表是黄宗羲，其直接影响是“康乾盛世”的出现。

清兵入关以后，黄宗羲进行了八年抗清复明的斗争。在实践中，他看清了明王朝的腐败，对他的民本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。经过长时期酝酿，写成名著《明夷待访录》，集中阐发了自己的民本思想。

首先，提出了君为民众、君为民仆的思想。他说：“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；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，有公害而莫或除之。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；不以一己之害为害，而使天下释其害；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。夫以千万倍之勤劳，而己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故古之人君，去之而不欲入者，许由、务光是也；入而又去之者，尧舜是也；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，禹是也。”（《原君》）就是说，最初的“君”，不过是人民为了兴天下之“公利”，除天下之“公害”而设的，他以超过人民“千万倍之勤劳”为人民办事，“而已不享其利”，纯粹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。进而，黄宗羲又指出：“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。”（同上）在这里，“天下”即“兆人万姓”；“天下为主”，即人民是天下的主人、政治的主体。“君为客”，是指君主是“一人奉天下”的公仆，他毕生的经营都是为兆人万姓谋利去害。然而，三代以下的情况就不同了。黄宗羲指出：“后之为人君者不然。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，亦无不可；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。……今也以君为主，天下为客，凡天下之无地而安宁者，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财产，曾不惨然。曰：‘我固为子孙创业也。’其既得之也，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。曰：‘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’然而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。”（同上）现在，“君”与“天下”、“客”与“主”，正好倒了个：原本以千万倍之勤劳使天下受其利，而已不享其利的“君”，现在“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”，把“四方之劳扰，民生之憔悴”视为“纤芥之疾”（《原臣》）。铁一般的事实说明：“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。”这样，黄宗羲把孟子的“民贵君轻”论发展为“君客民主”论，进而，又把孟子“闻诛一夫”说，发展为暴君放伐论，以除“天下之大害”。在这里，黄宗羲实际上发出了伐君革命的呐喊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